

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陶建杰

(上海大学 影视学院,上海 200436)

摘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能力较差、信息渠道狭窄单一的特点,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从人际、组织、传统媒体、新媒体四种信息渠道入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感知易用、感知有用、使用态度、外部变量等因素在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意愿中的作用。研究表明:信息渠道使用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影响使用意愿的诸因素中,感知易用是最基础因素,感知有用是最重要因素,使用态度是最直接因素,学历、工作稳定性、外出方式等外部变量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信息渠道使用意愿。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意愿;技术接受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3)02-0011-08

一、研究背景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作为官方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使占农民工总数60%左右,拥有1亿多人口规模的80后、90后农民工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1]本研究也采用这一界定。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成长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在他们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体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观念、身份认同、社区认同、乡土认同等方面的鲜明特征。^[2]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高,工作耐受力低。^[3]

“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使他们具备了更好的信息传播基础,也决定了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对信息的需求更迫切、传播行为更活跃。在涉及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衣食住行、维权社保、文化娱乐、健康医疗等,都离不开传播的重

要环节——信息获取。但在实际中,依然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除了自身信息获取能力弱、信息获取不平等的制度性障碍外,信息获取渠道狭窄是一个非常因素。^[4]一般而言,信息获取有三个最基本的渠道:人际传播渠道、组织传播渠道、大众传播渠道。就人际渠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传播依然难以突破“地缘、业缘、亲缘”所编织起来的相对狭小的圈子,与市民阶层难以形成真正的信息融合与有效互动^[5],各种信息总是“低水平重复”;就组织渠道而言,尽管各级政府近年来陆续贯彻中央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相关政策,但这些信息服务大多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和统筹性。而企业、信息中介服务机构等其他组织传播主体,出于盈利目的、专业化水平等的限制,也不能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太多切实有效的信息;就大众传播渠道的主体——各种媒介而言,目前基本没有专门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信息服务的固定栏目、版面、频道、频率,少数农民工网站也因为缺少资金、访问量低或半途而废,或步履艰难。总之,在信息海量的今天,与市民群体已经建立起全方位的信息渠道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整个农民工群体,不仅仍然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弱势群体,

收稿日期:2012-12-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XW030);上海大学高校085学科内涵建设子项目(2011-02)

作者简介:陶建杰,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发展传播。

更是信息生活中的“边缘人”,他们的各种信息渠道,存在着多种“断裂”现象。^[6]信息渠道的断裂和边缘化,又进一步弱化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制约了他们的发展潜力,因此形成的“知沟效应”在当下中国的农民工与市民两大群体之间,显得尤为突出。

但较为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多从外部视角关注群体特征以及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缺乏从心理动机、主观意愿等内部视角的分析。这一取向,同样也体现在传播学界。传播学界的农民工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视角:一是“媒体呈现”。多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媒体中的农民工形象,发现对农民工群体存在着媒介歧视,污名化、标签化、刻板印象明显。^[7]二是“媒介行为”,一般围绕媒体接触频率、种类、内容、时段、场所等展开。^[8-12]还有少数学者从传播对农民工观念的影响,新媒介技术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的影响等角度进行探讨。^[13-14]总体来看,也多属于“外部视角”,缺少对传播过程内部结构的分析,且多数研究只关注传统媒体,没有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纳入同一研究框架,缺少对农民工的信息传播进行全方位考察。此外,也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的群体分化,鲜有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专门研究。所以,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时,很有必要从传播过程这一“内部视角”出发,以信息渠道使用为切口,对农民工的传播行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较前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如学历高、观念新、适应性好,融入城市意愿强、学习欲望需求旺等,这些都为他们扩展信息渠道,进行更活跃的传播活动提供了较好的基础。那么,在相对良好的自身条件下,如果从内部视角考察信息传播行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意愿的因素有哪些,各种因素间又有怎样的关系?本文以技术接受模型(TAM)为基础,以结构方程模型为分析工具,试图探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意愿的因素及各因素间的关系,从而为更好的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提升有关部门的农民工信息服务水平、增强信息供给的有效性,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社会融合,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1. 理论框架

在拉斯韦尔经典的“5W模式”中,传播渠道是

构成传播过程的五个核心要素之一。这里所指的“传播渠道”,既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在内的大众传播渠道,也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其他形式的渠道。实际中,由于大众传播媒体的极度发达,传播学界对传播渠道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这也同样表现在对农民工信息传播渠道的研究中,呈现出“单一化”“重复化”“大众媒介化”的特点。

如果转换一下视角,跳出大众传播,从内容的角度看渠道,现有对农民工信息传播渠道的研究较少,实证研究更少。郑欢、江颖红发现,报纸、电视、计算机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但被问及对不同渠道信息的信赖程度时,排在前四位的为政府、报纸、电视和亲友。^[15]区晶莹等针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发现,电视、朋友家人亲戚与邻居、报刊杂志是农民工的主要信息渠道,社区公告栏、广播、公交、地铁广告、信息中介、政府机构和所在企业等渠道获取信息的较少。^[16]陆雪梅的研究支持了同样的观点:电视是农民工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其次是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与亲朋好友、同事、老乡等人际交流仍然还是农民工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17]

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农民工对某一类信息的获取渠道,作了调查。胡晓鹰发现,农民工的职业信息来源渠道主要是亲友介绍、企业招工,选择劳务市场、大众传媒的几乎为零。^[18]伍骏骞等在南京的调查数据,王建华等在河南的调查数据,也同样支持了人际渠道对农民工求职中的首要作用。^[19-20]梁媛、王书华针对农民工的公共卫生信息渠道研究表明,报纸和电视是农民工接触公共卫生信息的两大主要渠道,互联网居于第四位,值得注意的是,社区的宣传(包括宣传册、宣传栏、宣传车在内)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21]彭琳彦则对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渠道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她以广州制衣行业女工的信息需求为研究对象后发现,女工对人际传播渠道和传统传播渠道(包括电视广播和图书报刊杂志)使用率较高,网络的使用率也较高。但通过信息咨询机构(包括中介机构)、公告栏等渠道获取信息较少。不同信息的获取渠道也有差异。物质类信息主要通过亲友告知和中介机构;就业信息主要通过亲友告知;安全类信息主要通过电视广播和亲友告知、网络;社会类信息主要通过电视广播获取。^[22]

综上,已有绝大多数研究都发现,以电视为代

表的大众传播和以亲友老乡为代表的人际传播是农民工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使用互联网。而以企业、社区为代表的组织传播渠道,似乎在农民工信息渠道中经常缺位。但目前的研究不足也显而易见:宏观政策分析多,微观实证支持少;总体研究多,群体分化少;描述性角度多,分析性角度少;对策研究多,理论思考少,需要有进一步的研究来完善。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除了以往描述性研究为我们展示的农民工信息获取渠道现状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形成这样的信息渠道格局? 决定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意愿的相关因素到底有哪些? 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 在理论框架上,目前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最优秀的理论模型之一——技术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由于结构简单和各种实证对其价值的证实,使该模型在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3]这也为我们的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技术接受模型源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理性行动理论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24]该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个行为前,会综合各种情况来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其中,个人和他所处的社会普遍观念是一个人的态度和价值观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个人态度和价值观又决定了他是不会产生采取某种特定行为的动机,动机最终决定了某种行为最后是否被他所采纳。戴维斯 (Davis) 将理性行为理论运用到技术接受领域,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他认为,使用者感知是产生意愿的基础,即对某项技术的使用意愿是受到对此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决定消费者对技术的态度,态度进而影响行为意向,同时感知有用也会对使用意愿产生直接影响。此外,外部变量也会对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产生影响。^[25]技术接受模型的框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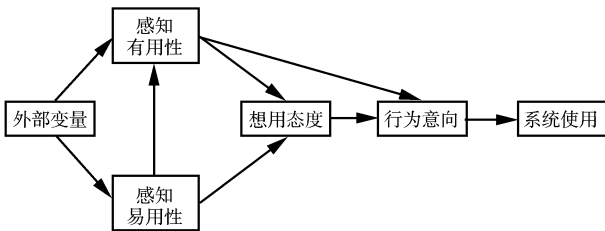


图 1 Davis 的技术接受模型

2. 研究假设

受到理性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的启发,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信息渠道的选择,也是综合了各种实际情况后的理性行为。信息渠道使用意愿,受渠道易用性、渠道有用性、对渠道的态度,以及包括人口特征、流动特征等在内的外部变量的影响。根据 TAM 模型,我们建立了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模型,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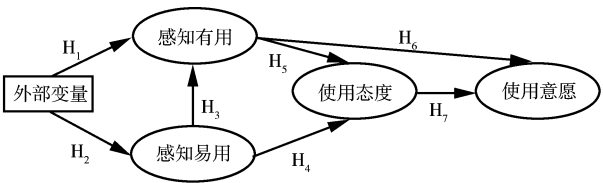


图 2 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模型

(1)外部变量。戴维斯认为外部变量会直接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进而间接地影响使用态度、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我们之前的研究也发现,外部变量诸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外出务工时间等人口特征,流动特征、社会融合方面的变量,对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信息满意度评价等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H₁:个体特征、流动特征、社会融合等外部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感知信息渠道有用性会产生影响。

H₂:个体特征、流动特征、社会融合等外部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感知信息渠道易用性会产生影响。

(2)感知易用性。TAM 模型中,感知易用性是指个人相信使用特定的信息且不需要努力的程度,便能达到所预期的效果。本研究中,渠道易用性的定义是农民工相信自己能使用各种渠道获取相关信息的容易程度。作为相对弱势的群体,农民工在经济、知识等各方面都属于社会较低层,再加上原先的农村生活比较封闭,他们天生的对新技术、新事物有畏难情绪。本研究提出假设:

H₃:渠道的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H₄:渠道的感知易用性对渠道的使用态度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3)感知有用性。戴维斯将感知有用性定义为“在组织环境中,使用者对于使用的信息系统或信息技术将会提高其工作绩效或者学习表现的期

望主观机率”。借用这个表述,农民工的感知渠道有用性可以理解为:通过某种渠道,能给农民工带来各种信息,满足他们多样的信息需求。感知有用性是激发农民工选择某个信息渠道最直接的因素,据此产生假设:

H₅:渠道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态度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H₆:渠道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意愿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4)使用态度与使用意愿。态度是个人对某种事物所持正面或者负面的评价。我们这里的使用态度,是指农民工对某种信息获取渠道感到满意并接受。态度是决定使用意愿的重要前提,很对基于TAM模型的研究都已经验证了态度对意向的预测作用。^[26]态度本身是一个较难测量的指标,为简化起见,我们用信任度来指示态度。一般的,农民工对某个渠道越信任,他对这个渠道的态度也越正面、积极,也就越愿意使用这种渠道去获取信息。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意向是预测行为的良好变量,是个人从事某特定行为的最直接决定因素,其他因素都是经由行为意向间接影响个人行为的。^[27]本文中的使用意愿,是指农民工对通过某个渠道获取信息的主观概率判定,是通过某种渠道获取信息的明确意愿表达。我们提出假设:

H₇:渠道使用态度对使用意愿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1. 操作化定义

感知有用、感知易用、使用态度、使用意愿都属于不可直接测量的潜变量,必须要把对潜变量的测量,具体化为若干个测量指标。本研究,所有的测量指标均为一句陈述句,每句陈述句后,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从“很不同意”(用1表示)到“很同意”(用5表示),让受访者依次打分。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日常信息接触的实际情况,我们从电视、上网、熟人、社区四种渠道来设计问题。通过前期调查及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渠道,主要来自电视和人际交流,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而这三种信息获取方式,恰好代表了大众传播中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渠道、人际传播渠道。此外,每个人都归属于一定的社区、企业等相关组织,人不能脱离组织而独立存在,我

们也加入了“社区”这一信息获取渠道,以此作为对组织传播渠道的测量。因此,每个潜变量都包含传统媒体、新媒体、人际、组织四种渠道的测量指标。具体来看:

感知易用性的测量指标为:陈述句“通过电视(或上网、熟人、社区)得到各种信息较容易。”

感知有用性的测量指标为:陈述句“电视上(或网上、通过熟人得到、社区发布)的信息是有用的。”

使用态度的测量指标为:陈述句“电视上(或网上、通过熟人得到、社区发布)的信息比较可信。”

使用意愿的测量指标为:陈述句“我愿意通过电视(或上网、熟人、社区)获得信息。”

针对潜变量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最为有效的方法。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的模型,综合了路径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清晰反映单项指标对总体的作用和单项指标间的相互关系,特别适用于“验证性”研究。本研究使用Lisrel 8.7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 数据获得

本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层次与传播机制研究》。2012年1—3月,课题组在上海、嘉兴、北京、深圳四地,对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农民工一般可以分为两类:“散居”(自己租房居住,与市民混居在一起,多为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家庭户)和“聚居”(主要分集体宿舍式和村落式聚居两种形式)。我们在各城市分别选择两个区(县),按照街道、居委会两阶段抽样后,每个城市选中10个居委会,将各个居委会出租屋登记名单中的所有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的抽样框,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散居”类农民工。根据事先配额,在上海、嘉兴各抽400名,深圳、北京各抽取200名。同时,又在上述四城市各选择1个大量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对名单中的农民工进行等距抽样,四地共抽取“聚居”类农民工400名。此外,我们在上海、嘉兴各确定一所农民工小学和一所农民工幼儿园,对学生家长进行等距抽样,共获得学生家长样本400名。通过这三种抽样方式,兼顾了样本来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我们共发放了2000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614份,有效率80.7%。其中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符合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定义

的有 931 人,男性占 45.22%,女性占 54.78%。本文以这 931 人为分析样本。

四、主要研究发现

在模型拟合前,我们对各潜变量进行了信度分析。四个潜变量的 α 系数分别为 0.773、0.744、0.741、0.768,均大于 0.7 这一可以接受的水平,表明所有变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通过 Lisrel

8.70 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并参考软件提供的 MI 修正指数多次调整后,最终的拟合结果见图 3。模型的 $\chi^2 = 481.48$, $df = 84$, $RMSEA = 0.0713$ 。根据表 1,拟合结果看,所有标准化路径系数 T 值均大于 1.96。整个模型的 RMSEA 值为 0.071,稍大于标准值,但也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28]表 2 提供了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及判断标准。经过比较后发现,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均较为理想,效度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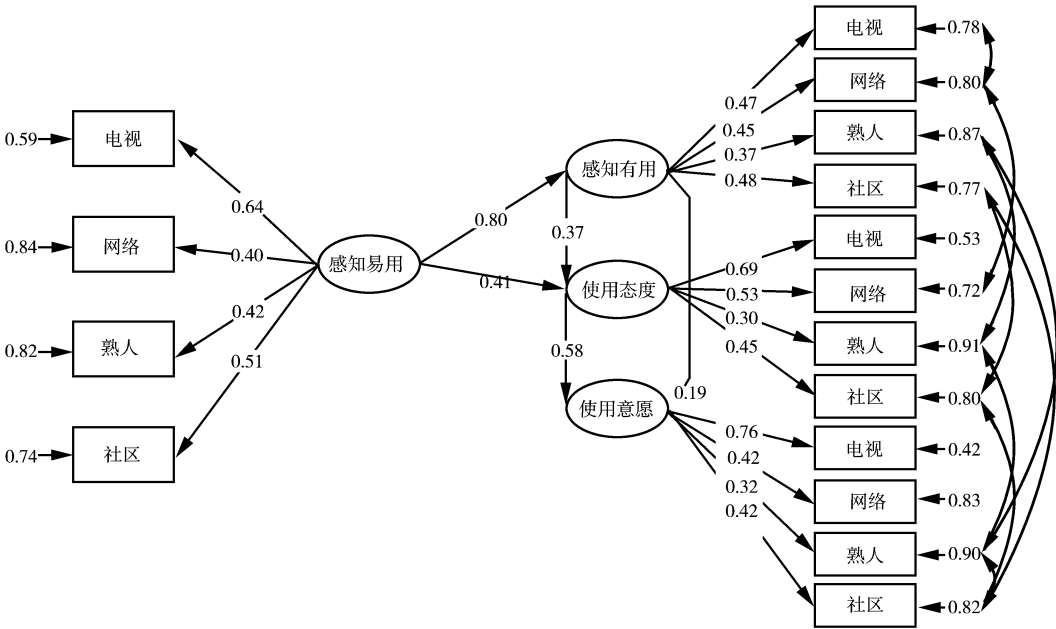


图 3 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的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系数)

表 1 结构方程模型主要参数及研究假设的验证结果

路径	符号方向	标准化路径系数	T 值	假设	验证结果
感知易用→感知有用	+	0.80***	8.88	H ₃	支持
感知易用→使用态度	+	0.41**	3.10	H ₄	支持
感知有用→使用态度	+	0.37**	2.66	H ₅	支持
感知有用→使用意愿	+	0.19*	2.20	H ₆	支持
使用态度→使用意愿	+	0.58***	6.37	H ₇	支持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2 模型的拟合指数

拟合指数	绝对拟合指数				相对拟合指数			简约拟合指数	
	χ^2/df	GFI	RMSEA	SRMR	NFI	NNFI	CFI	PNFI	PGFI
标准	<5	>0.90	<0.06	<0.08	>0.90	>0.90	>0.90	>0.50	>0.50
本文模型	5.73	0.939	0.071	0.061	0.919	0.902	0.932	0.643	0.580

1. 互联网是农民工最容易获取信息的渠道

表 3 提供了四种信息渠道共 16 项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值。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互联网是最容易获取信息的渠道,然后依次是电视、社区、熟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较好的掌握

了新媒体使用方式,基本具备了运用新媒体获取个性化信息的能力,他们也最有意向通过网络获取各种信息。除了互联网外,传统媒体、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三种渠道,在新生代农民工日常信息获取中“三足鼎立”的格局不变。

表 3 各潜变量测量指标的均值、标准差

	电视	网络	熟人	社区
感知易用	3. 29(1. 00)	3. 61(1. 00)	3. 24(0. 91)	3. 26(0. 91)
感知有用	3. 33(0. 94)	3. 20(0. 86)	3. 28(0. 86)	3. 60(0. 88)
使用态度	3. 07(0. 93)	2. 92(0. 89)	3. 28(0. 86)	3. 41(0. 87)
使用意愿	3. 14(1. 03)	3. 42(1. 03)	3. 24(0. 98)	3. 26(0. 97)

注:括号外为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2. 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质量评价最高的渠道

在信息有用性和使用态度(信任度)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首推“社区”渠道,网络则跌至最末。可见通过组织渠道传播的信息,公信力、针对性、权威性最高,而网络信息尽管易得,但这些方面较差。这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他们在日常各种信息渠道的使用中,质与量的差异、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的差异。

3. 感知易用是影响渠道使用意愿最基础的因素

“感知易用”对“感知有用”和“使用态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 80 和 0. 41,T 值均通过了检验,说明“感知易用”对“感知有用”和“使用态度”都存在着直接正向的影响,H₃ 和 H₄ 得到了验证。模型表明,感知易用不仅对感知有用和使用态度有直接的影响,并通过二者,最终对渠道使用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因此,要让新生代农民工愿意通过人际、组织、大众、新媒体等多渠道去获取信息的首要环节,是让他们能感到接触各种渠道是便利的,易用性缺失,也会大大削弱农民工对渠道有用性的感知。

4. 感知有用是影响渠道使用意愿最重要的因素

“感知有用”到“使用态度”和“使用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 37 和 0. 19,T 值也都通过了检验,说明“感知有用”对“使用态度”和“使用意愿”均存在直接正向的影响,因此 H₅ 和 H₆ 也得到验证。感知有用,不仅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渠道使用意愿,也通过使用态度,间接影响到使用意愿,对使用意愿的总效应为 0. 40,极为关键。其实道理很简单:信息渠道只有让使用者感到真正有用,用户才会选择和接受它。

5. 使用态度是影响渠道使用意愿最直接的因素

“使用态度”到“使用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 58,T 值也通过了检验,H₇ 所提出的“渠道使用态度对使用意愿有直接正向的影响”得到了支

持。从模型可知,使用态度不仅对使用意愿有直接作用,同时也是感知易用、感知有用等因素对使用意愿发挥作用的中介。农民工对新事物、相对复杂的事物,往往不信任、恐惧甚至排斥。信任是接受的前提,是产生使用意愿的根本保证。值得注意的是,从实际看,农民工对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信任度较高,但从模型拟合的结果看,四种渠道到使用态度的系数,较高的反而是电视(0. 69)和网络(0. 53)。这说明,对电视、网络的态度,与农民工总的渠道使用态度关系最密切。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最密切的渠道,恰恰是农民工目前较不信任的。

6. 学历、工作稳定性、外出方式对渠道使用意愿有一定的影响

Lisrel 软件能自动计算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这两个潜变量的得分。通过 T 检验和方差分析,我们发现,不同学历、工作稳定性的农民工,感知有用分值有显著差异,学历越高,工作越稳定,得分越高。仅有学历、外出方式两个外部变量影响感知易用,学历越高、集体外出的农民工,感知易用得分越高。至于在年龄、婚姻状况、流动时间、流动目的、社会融合等方面不同的农民工,感知渠道易用性和有用性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因此,H₁ 和 H₂ 得到了部分支持。由于感知易用、感知有用最终都会影响渠道使用意愿,所以学历、工作稳定性、外出方式等外部变量,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渠道使用意愿的因素。

五、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以经典的理性行为理论和 TAM 模型为依据,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渠道使用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揭示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的若干因素及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提出的七项具体假设,五项获得完全支持,两项获得部分支持。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与本文对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基本预期一致,这说明,经典的技术接受模

型,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渠道使用意愿中,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所具有的新特点,以及本文重点在于试图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影响信息渠道使用意愿背后的因素,我们的研究与以往对农民工信息渠道的研究相比,新的发现主要有四点。

(1)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中“知行不一”现象非常突出。从“知”的角度看,农民工对组织传播渠道有较大的信任度,并抱以较高期望,评价最高。从“行”的角度看,互联网是农民工目前最容易获取信息并有意使用的渠道。这种“知行不一”,固然与近年来新媒体的迅猛发展、逐步降低门槛密切相关,但更主要在于实际生活中组织传播的缺位。目前,作为自组织形式的老乡会处于非正式性的相对松散运作;作为他组织形式的企业多数尚未认识到还兼有对农民工进行组织传播的责任,除了刚性的生产管理制度外,很少有宣传栏、内部论坛、员工社团等组织传播渠道;政府的组织传播往往停留在政策宣传,受制于精力、人力、物力等,传播缺乏个性化和贴近性。多方因素,导致针对农民工的组织传播一直较弱,信息需求—供给“错位”明显。但农民工对组织传播又期待较高。因此,组织传播渠道建设是今后对农民工信息传播的重要环节。

(2)受多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直接表现出来的信息渠道使用意愿背后,与感知有用、感知易用、使用态度,以及个体特征、流动特征等若干外部因素密不可分。这些因素,互相之间也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最终共同决定了农民工的渠道使用意愿。对这些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厘定,也就是对农民工信息传播结构、传播过程有了更清晰认识,有助于深入揭示农民工的信息传播行为。同时,也能意识到,影响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意愿,必须从上述方面多角度入手,形成合力,充分考虑到农民工在信息渠道选择中的主观感受和动机。

(3)渠道有用对使用意愿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极其重要。感知有用性,不仅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渠道使用意愿,也通过使用态度,间接影响到使用意愿。本课题的其他研究发现,尽管有40.71%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周围有社区或企业的信息公告栏”,但仅有17.48%的表示“信息经常更新”;有21.48%的人表示“有老乡会”,但实际参加的人,也仅占12.16%。这说明,农民工最信任

的组织传播,渠道有用性与期望存在较大差距。提高农民工对渠道有用性的感知,首先要做好内容,从差异化、换位思考、自下而上定位、个性化、公益性等途径加以改进;其次,也要提高渠道的传播效率。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成长性的特点和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迅速、高效的调整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策略,对他们的诉求予以及时反馈。

(4)农民工的代际分化,以及更进一步的代内分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渠道使用意愿。以往研究,均没有从分化视角对农民工的信息渠道使用进行考察。本文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学历、工作稳定性、外出方式的人,由于对渠道易用性和可用性评价的差异,相应的也会在渠道使用意愿上产生差异。总的说来,有较高文化程度、工作较稳定、自我发展型外出的农民工,越觉得身边信息渠道丰富、渠道有用和易用性较好,越愿意接触网络等新渠道,这部分人往往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意见领袖”。因此,重点关注“意见领袖”的信息行为,培养他们多样的信道使用意愿,然后通过这些“意见领袖”发挥二级传播中的人际渠道优势,进而带动更大范围内的农民工,建立起全方位、多元立体的信息获取渠道,也应该成为未来工作的一个重点。

参考文献:

- [1]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判·对策建议[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
- [2]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 [3]何磊.冰山出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来了[N].中国青年报,2005-7-11.
- [4]徐艳霞.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及其实现途径[J].理论探索,2010(2):94-96.
- [5]陶建杰.农民工人际传播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5):97-104.
- [6]李红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中的断裂现象[J].青年研究,2011(2):15-22.
- [7]许向东.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投影——传媒再现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0):42-45.
- [8]陶建杰.民工的媒介接触状况及评价——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J].新闻大学,2003(4):44-47.
- [9]陈静.长沙市农民工媒介消费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8.
- [10]张雅利.农民工媒介接触状况及评议——以兰州地区为调查分析单位[J].东南传播,2008(4):114-116.

- [11] 郑素侠. 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调查[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0(10): 121-125.
- [12] 李宁. 新生代农民工媒介使用情况调查[J]. 新闻爱好者, 2011(10): 149-150.
- [13] 陶建杰. 大众传媒对民工观念的影响力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4(2): 10-15.
- [14] 丁未, 田阡. 流动的家園: 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9(1): 61-70.
- [15] 郑欢, 江颖红.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行为与传播责任[J]. 广告大观(理论版), 2012(1): 4-11.
- [16] 区晶莹, 张淞琳, 俞守华. 基于偏最小二乘通径模型的农民工信息能力综合评价[J]. 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 2011(4): 495-501.
- [17] 陆雪梅. 农民工信息服务需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 广州: 中山大学, 2010.
- [18] 胡晓鹰. 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与服务对策研究[J]. 图书馆论坛, 2011(5): 42-44.
- [19] 伍骏骞, 陈奕山. 农民工视角下的就业信息获取和利用研究——基于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J]. 农村金融研究, 2011(12): 53-57.
- [20] 王建华, 李录堂. 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43位农民工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 软科学, 2010(12): 98-102.
- [21] 梁媛, 王书华. 农民工接触公共卫生信息渠道[J]. 中国国情国力, 2007(3): 43-44.
- [22] 彭琳彦. 广州制衣行业女工的信息需求及其信息保障研究[D]. 广州: 中山大学, 2010.
- [23] Agarwal, R., Prasad, J. . A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Germane to the Acceptance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J]. *Decision Sciences*, 1999(2): 361-392.
- [24] Davis, F. D. . *A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r Empirically Testing New End-user Information Systems: Theory and Results* [D]. Cambridge: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1986.
- [25] Davis, F. D. , Bagozzi, R. P. , & Warshaw, P. R. . User Accep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of Two Theoretical Models [J]. *Management Science*, 1989(8): 982-1003.
- [26] 林冬冬, 姜永刚, 李寅初. 中老年消费者对网络信息接受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1): 48-54.
- [27] Fishbein, M. , & Ajzen, I. .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M].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75.
- [28] Browne, M. W. , Cudeck, R. . *Alternative Ways of Assessing Model Fit* [M]// K. A. Bollen, J. S. Long (Eds.) . *Tes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3: 136-162.

(责任编辑: 李良木)

Research on Factors Affecting Information Channel Using Intention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AO Jianjie

(School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6, China)

Abstract: Basing the research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considering the weak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mono-channels of information on the part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starting from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channels of interpersonal, organizational,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an empirical study concerning the using intention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for information channel was conducted. Then effects of the factors on the information channel using inten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ere tested, which included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rceived usefulness, using attitude and other external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formation channel using is a systemic and complex process, basically influenced by perceived ease of use, mainly influenced by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directly influenced by using attitude. Education level, job stability and migrating style and others are also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intention to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formation Channel; Using Intenti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